

利用的价值，因为他手里掌握一些伪军，这些伪军中又多是他的旧部下，杀害于芷山一个人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在这个时期，一定把他铲除掉，万一激起他旧部愤怒，有一个团或者一个旅起义，那将对日军带来很大的不利。在这次暴力的“教育”下，如果他能够得到“教训”，也就行了。同时对其他不忠于日敌的汉奸，也起了一定程度的“教育”作用。

于芷山受到这次惩罚，得到了“教训”，不用说再也不敢对日敌表示不满，说三道四，就是在他的内心连“骑墙”的念头也消除净尽，一心一意地为日敌效劳，作走狗。因此，后来于芷山能够在伪满爬到伪大臣和伪将军那样高的职务。

爱新觉罗·吉兴其人^①

傅大中

吉兴，号培之，辽宁奉天人。姓爱新觉罗，满清皇族出身。吉兴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，本世纪20年代投奔奉系军阀集团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为东北军中将旅长兼延吉镇守使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率东北军一旅投敌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汉奸的骂名。伪满建立后，他历任延吉警备司令、吉林警备军司令、第二军管区司令、溥仪的侍从武官长、伪满末期任尚书府大臣。吉兴在伪满军中，是十二上将之一，与张景惠、张海鹏、于芷山、于琛瀚齐名为“五将军”。

^① 此为原文的副标题，此文为节录。

一、借皇荫留学日本（略）

二、投奔奉系集团

吉兴归国后，按去日本时清廷的规矩，他可得到守备、千总级武职出身。但这时清廷正刻意编练新军，于是吉兴被派到驻新民的北洋新军二十镇，做了见习军官。不久，辛亥革命爆发，清廷被推翻，吉兴的政治生活遂即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

辛亥革命后，吉兴一度失望，但由于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，他的军事专长有了用武之地，民国后他先任奉天督都府编制科一等科员、代理科长，后转奉天镇安上将军公署一等科员。

本世纪20年代，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在东北崛起，有位西方学者在研究奉系集团崛起的历史条件时说过：“那个时期，不论是对士兵还是对官僚说来，除依附于他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的职业晋升之路了”。吉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投奔了这个集团。1916年张作霖攫取奉天省军政大权后，吉兴出任安东鸭（绿）江（江）两江水上警察局长，升为中校。两年后，执掌北京政权的直皖两系军阀矛盾激化，段祺瑞为拉拢张作霖，策划了“秦皇岛劫械案”，奉系军阀由此得到了大量军火，遂即奉系军阀第一次出关，直抵湘鄂，吉兴出任奉军湘东司令部中校参谋兼二十七师参谋长，驻在长沙，开始为军阀混战运筹帷幄。不久转任北平奉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兼二十七师参谋长，升为炮兵上校。

奉军退回关外后，吉兴又参与了奉系集团兼并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活动。1919年张作霖兼并黑龙江省后，派亲信孙烈臣去督黑，孙带去了大批奉天人亲信拼凑班底，吉兴也随孙去黑省戍边，担任黑龙江省炮兵团长。两年后，张作霖再度兼并吉

林，孙烈臣转任吉林督军，吉兴又做为孙烈臣的亲信，随之到吉林，出任吉林督军公署参谋长，晋升为陆军少将。

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，吉林督军孙烈臣率大部队出关作战，后方留守事宜，吉兴以参谋长的身份全权处理。是时，吉林省境内的土匪乘机四起，由于兵力空虚，一时难以剿灭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吉兴为尽快稳定后方，使用了剿抚兼用的手段，收抚了土匪四大辮2 000余人，然后将其改编为4个大队，经简单训练后，用以讨伐其它匪股。吉兴用此办法，平定了吉林省境的匪患，稳定了后方，赢得了上司的赏识。

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军阀被打败，张作霖率队逃回关外，立誓要雪败战之耻，重新问鼎中原，遂即进行了一系列整军经武的改革，并在关内招揽了一批受过近代教育的军官，派充重要岗位。吉兴作为张作霖的幕僚，在这次改革中受命重任，转任延吉镇守使兼吉林步兵第十三混成旅旅长，被擢升为陆军中将。

当时延吉地区中日关系十分紧张，当地日本领事馆多次被烧，日本人也时有被杀，加之朝鲜民主主义者在此活动，日本帝国主义一直要寻机发难，中国方面在处理延吉中日关系上，一直感到棘手，派吉兴出任延吉镇守使职，实有临危受命之意。

吉兴到任后，将军队沿延（吉）、和（龙）、琿（春）、汪（清）、敦（化）五县驻防，担负国防和治安的双重任务。

在军阀战争中，吉兴开始发迹，从中校升为中将，逐渐成为了奉系军阀集团的骨干成员。

三、伪满汉奸生涯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又使吉兴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，事变后的第二天，日本驻龙井特务机关长河野某赶到延吉，向

他透露了一些事变情况，并试探他对事变的看法。吉兴从他多年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中意识到，这次事变非同一般，日本既然已经发难，决不会就此善罢干休，因此，他在事变后的几天里，一直心神不安，不做明确表示。不久，熙洽的吉林伪政权，在关东军的刺刀下建立，并给他发来电报，声称吉林独立，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，改副司令长官公署为吉林军政长官公署，并命令吉兴改任延吉镇守使为延吉警备司令，维持延吉地区治安。熙洽的电报无疑是给吉兴下了最后通牒，逼他做出明确选择。接受延吉警备司令一职，就意味着承认吉林伪政权，宣布公开投敌，否则，就有可能成为关东军或朝鲜军越境攻击的目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吉兴舍弃了民族利益，权衡了私利认为：“抗日弄不好家破人亡，投降较为有利，自己留学过日本，又会日语”。于是吉兴决意投降，召来部下3个团长开会商量，会上他先讲了对时局的看法，然后提出投降主张，由于3个团长基本赞成，吉兴顺利地率领这支4800人的东北军更换了旗帜，蜕变成了伪军。

吉兴投降后，使素有复辟野心的清廷后裔熙洽如遇知音，不久，他把吉兴遣去省城，以俩人共是清朝后裔的立场商量建立伪满洲国和推举溥仪的活动，吉兴听说要推溥仪当皇帝慷慨激昂，表示：他与我同亲同族，共为爱新觉罗子孙，他当皇帝我岂有不同意见之理。但他也感到这件事情重大，来得太突然了，心中没底，于是他向熙洽询问7个重大方面的问题如何处理，即无兵无钱怎么办？国防怎么办？国际上不承认怎么办？张学良回来怎么办？与东北民心相悖怎么办？人民反对怎么办？社会贤达不拥护溥仪怎么办？熙洽很干脆地向他露底，有关东军保护，一切好办。并说：东北富庶，筹款练兵容易，国防上与南次郎有协议，交由日军负责。吉兴听到最关心的国防问题与日本有

协议，向熙洽追问内容，熙略有难色地说：很简单，几句话打个戳。然后扭转话题，示意他加紧做推举溥仪的活动。

吉兴与熙洽密谋后，旋即利用日本留学的关系，遍访了关东军头面人物，在本庄繁、多门二郎、大迫通贞等人面前，为复辟清朝统治游说。

伪满成立后，吉兴因率部投敌有功，被擢升为吉林警备军司令，统辖吉林全省的伪军。1934年伪满改元，吉兴继任第二军管区司令。在这以后的日子里，吉兴以其“卓著”的汉奸才能和汉奸活动，赢得了日寇的赏识，其中最突出的一例，即是他在伪满京畿的吉林地区，连任了9年军管区司令，创下了日寇使用汉奸的奇迹。这期间，随着日伪在东北统治秩序的确立，和日伪统治政策的一系列变化，日寇对汉奸也采用了“宠赐有加，控制使用”的对策，和吉兴同期投敌的一些汉奸“开国元勋”，多数被褫夺了实权，不是被派充闲职，就是被迫退役，其他的军管区司令，都已数易其人。吉兴能长期受到重用，究其原因，秘密有三：

第一，吉兴是难得的有思想、有谋略的汉奸人才。

在他还是延吉警备司令时，他就开始在日寇面前显露了他的汉奸才能。延吉地处中朝边境，鲜汉民族杂居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日本帝国主义就在当地设置特务机关和领事馆，多次挑起民族纠纷、制造矛盾，积极从事侵华活动，致使该地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又使矛盾进一步激化，一时，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揭杆而起，土匪也乘机而起，抢劫绑票蜂拥而至。当时关东军无意进兵延吉，第二师团占领吉林后，主力西调准备攻打齐齐哈尔。面对延吉的局势，关东军为尽快确立该地的统治秩序，曾命令留守部队和铁道守备队进行讨伐。由于情况不熟，关东军对抗日武装和土匪一律采用

讨伐对策，但由于延吉山多林密，讨伐经常是兵至匪散，不见成效。吉兴在这个问题上，出手要技高日本军人一筹，他对土匪使用剿抚兼用办法，一面派兵讨伐，一面出示收抚，改编成伪军。吉兴的措施，对土匪起到了分划瓦解作用，对此，他曾得意地说：数日之后，少有效果，稍可维持治安于眉睫。在制止住土匪的活动以后，他又向军事顾问提出根治延吉地区治安的三点长久之策，其一，对抗日武装加紧讨伐；其二，收抚散乱逃兵；其三，严加控制部队，加强整顿训练，防止哗变。由于吉兴的效力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寇大体上控制住了延吉地区的局势。

1932年吉兴升为吉林警备军司令，他又巧施谋略，消灭了殿臣绿林抗日武装。殿臣是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活动在吉林境内绿林抗日武装中规模较大的一股，最先起事于辽宁宽甸，后进入吉林的磐石、桦甸地区。一度以永吉县烟筒山为中心，时常出没于吉林郊区，破坏铁路，袭击日伪军，严重地威胁着日伪的吉林统治中心，日伪当局多次予以讨伐，但均建树不大。吉兴则通过各种途径，联络这股绿林武装的内部人，后收买了一个叫刘东坡的头目，以团长职位诱使其率部倒戈，这支武装受到打击后，吉兴又收买人将其首领至殿臣暗杀，彻底瓦解这支抗日武装。

吉兴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确立在东北的统治过程中，不但有谋略，而且还有幻想。

伪满建立初期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达到了高潮，同时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随官长糊里糊涂当上伪军的下级官兵，这时也彻底明白了自己的身份，他们在抗日运动的推动下，也不断以逃亡、哗变的方式进行反抗。这种局面使日伪统治当局十分头痛，吉兴这时谒见日本顾问，献计两条，提出解决伪满初期

人民反抗和士兵哗变的具体方法。对人民的激烈武装反抗，吉兴提议用讨伐的办法将其压迫到山中，然后使用“断交通、封锁粮道”的办法，使其日久无粮，不打自散。吉兴的建议深得日寇的赏识。伪满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规模推行了“集团部落”等法西斯措施，意在分离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，吉兴正是在伪满初期即提供了这一“思想”，无疑对日本帝国主义制定镇压人民的政策，提供了依据。

对防范伪军的哗变，吉兴建议在伪满实行日本式的征兵制度，废除中国传统的募兵制，用良家子弟替换兵痞，用军官学校培养的军官，淘汰旧军官，甚至具体地提出淘汰旧军官的办法，采用停年制，以从根本上改造伪军。

第二，吉兴是镇压东北人民抗日运动的“实干家”和日寇的忠实鹰犬。

这有两件具体事例。其一，1935年8月，关东军制定了“十年肃正计划”，调动日伪军警对奉天、吉林、间岛、安东、滨江5个地区，进行了残酷的军事讨伐和血腥的政治镇压。这时吉兴刚出任第二军管区司令不久，按理他应指挥全省伪军的讨伐，但他为表现出实干精神，亲临讨伐重点敦化指挥，并在敦化地区推广了他“封锁粮道，断绝交通”的办法，大规模实施集家并户政策，使讨伐队在山区见房就烧，对逃避集家并户的人，一律视嫌疑犯处死。这场讨伐，吉林有敦化、桦甸、磐石、永吉、长春、九台、舒兰、德惠、蛟河十数县受浩劫，以敦化县受害最重，据载，仅该县寒葱岭一带，被当做嫌疑犯杀死的无辜百姓就有百余人。吉兴良知泯灭，残害同胞，换得了日本人的表彰，讨伐后他因功被授以一等大绶旭日章一枚。其二，1939年，日寇从伪满各地又调集大批军警，在吉长警备司令野副昌德的指挥下，对活动在延边、吉林和辽宁东部的抗联一、二军进行

了残酷的讨伐，吉兴在讨伐中，亲手组建了一支挺进队，专门用以捕杀抗联领袖。行前他亲去接见官兵，训示鼓动，让他们不惜一切把杨靖宇的头拿来。

吉兴在伪军管区司令中，以讨伐名将、勤于前线著称，他在9年军管区司令任上，几十次亲临前线指挥讨伐或督战，日寇对他这点十分欣赏，对他的“事迹”也多次在伪满报刊上报导宣扬，每年年终的国务宴会上，他都必受表彰。

第三，吉兴为人乖灵，处事谨慎小心，也是他长期受到日本人重用的一个秘密。

吉兴谙于官场世故，部下常去贿赂他，他都心安理得笑纳，反过来他也会用这种手段去讨日本要人的欢心。据他自己讲：曾送伪军政部高级顾问多田骏古瓷花瓶1对；第二军管区主任顾问中野英光白熊皮1张；广濑师团长法兰瓷瓶1对；第二军管区顾问滨田弘伪币2000元。这些日本人无疑都是决定吉兴命运的关键人物，吉兴的活动，加深了和日本人的感情，对他长期受到重用，起到了作用。

此外，吉兴在伪满期间，一直恪守着“尊口缄默”的宗旨，他汲取一些汉奸的教训，对日本人在伪满的政策，从不加任何评论，他对日本人的用意，既使看得透了，也隐匿于内心深处，不行见于色。例如，1934年日本陆军动用了4个师团、2个骑兵旅团及空军、机械化部队5万余人，在北海道搞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，伪满派吉兴为参观团长，领30余名军官去日本参观，吉兴很快就明白日本人的用意是“明为亲善，暗寓威吓”，因此，他在出发前就确定了一味逢承的宗旨，在整个访日期间，日本人制造了浓厚的日满亲善气氛，安排他发表看法，但他紧闭内心世界，逢场便讲，满洲国是日本缔造，对日本要念念不忘。他的内心秘密，甚至与心腹部下交谈时也不流露。吉兴的这段心

里秘密，直到他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后，才公开说了出来。

伪满期间，关东宪兵队曾通过收买汉奸高官身旁的人，秘密监视他们的言行，吉兴由于处事谨慎小心，在日本人眼中，一直留下了一个忠顺可靠的形象。

1941年春，吉兴被调离第二军管区，转任侍从武官长，做为溥仪的最高军事谘议官，终日陪伴着溥仪。侍从武官长实际上是闲职，没什么具体事务。据吉兴自己讲，他任侍从武官长期间，只有两件事还算得上工作，一是在有人朝贺时，侍从武官长侍于溥仪身旁，行站班礼仪；二是每年岁末，例行公事，代溥仪向各地赐慰劳品。

1944年吉兴转任伪尚书府大臣。从武官转任文官，名义上是因特殊功勋擢升，实际上是请他脱离军界。按伪满规定，尚书府仅是溥仪的一个办事机构，人员不过10名，日常工作主要是保管玉玺。吉兴做为大臣的具体工作是监督诏书、叙勋证书、任命状及伪满法令、章程的用印，月终列表统计用印，向溥仪报告。

1945年前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，彻底失败的迹象已经显露。为强化对东北这个兵站基地的控制，日寇把天照大神从日本搬到了东北，在东北各地修建了一些日本式的神社，试图从强化思想统治入手，牢牢掌握住东北。在日本投降前的一年里，吉兴陪伴着溥仪，每天上午在宫内府聆听日本的神博士讲天照大神，吉兴和溥仪毕恭毕敬。

1945年8月8日，苏联飞机袭击长春，吉兴等一批伪满高官才知道日苏已经开战。8月13日，他在伪满即将垮台的慌乱中，从伪中央银行掠得3万元现金和20万元支票（因苏军占领长春，未及提出），随溥仪逃到了临江县大栗子沟，准备携同日寇负隅顽抗。日本宣布投降后，8月19日古海忠之从长春赶到大

栗子沟，召开重臣会议宣布溥仪退位。吉兴向溥仪施完君臣大礼后只身逃回长春，8月31日被苏联红军在其家中逮捕，押往苏联。1950年吉兴被遣返回国，羁押于抚顺战犯管理所，1954年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。

（摘自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90年2期）

伪将军府将军于琛激

于光华

于琛激，伪满洲国治安部大臣，后晋升为将军（伪满称元帅为将军）。因为他脑袋大，外号叫“于大头”。我系他的侄孙。对他在“九·一八”以前的事情，因为我年幼知道的较少；关于他在伪满时的情况，则略有所知。现把我记忆中的一些情况写出来，作为参考。

出身于号称“九天十八德”的于家

于琛激原籍山东省登州府海阳县四马庄桃花社（清朝时的名称）。他的高祖可能是在清朝乾隆时代逃荒来到东北，落脚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山河屯镇西北约15公里名叫七星泡的电子，开荒种地。到他曾祖时期，他家生活逐渐富裕，成为小地主。他祖父由秀才而考取举人，由举人而考取进士，殿试时由皇帝点为翰林进入翰林院。在老屯七星泡竖有“恩赐翰林”牌坊，正面刻有“天赐人端”四个大金字。于琛激的祖父生有4子：长子于镇岳即我曾祖父；次子于镇山；三子于镇海；四子于镇江。由